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著

千古贤相诸葛亮

中国方正出版社

千古贤相诸葛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著

中国方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千古贤相诸葛亮/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编著. —北京: 中国方正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 - 7 - 80216 - 624 - 0

I. 千… II. 成… III. 诸葛亮 (181 ~ 234) —传记 IV. K827 = 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5499 号

千古贤相诸葛亮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 编著

责任编辑: 康 弘 刘彦彩

责任校对: 张 蓉

出版发行: 中国方正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平安里西大街 41 号 邮编: 100813)

发行部: (010) 66560938 门市部: (010) 66562733

编辑部: (010) 59596602 出版部: (010) 66510958

网址: www.FZpress.com.cn

责编 E-mail: fangzheng1313@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6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ISBN 978 - 7 - 80216 - 624 - 0

定价: 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汉末倾颓 呼唤廉政	(1)
政治腐败 矛盾激化	(3)
灾荒数现 重人轻财	(7)
乱世批判 奢侈除淫	(11)
战乱频发 减财避祸	(13)
观念转变 廉行有道	(15)
第二章 耕读隆中 清廉之基	(19)
出生乱世 少年漂泊	(21)
初到襄阳 结交名流	(25)
耕读隆中 价值初定	(28)
审时度势 蛰居待时	(34)
第三章 明君良臣 千古楷模	(37)
半生辗转 寄寓荆州	(39)
三顾茅庐 隆中对策	(41)
临危受命 联吴抗曹	(46)
创立蜀汉 功勋卓著	(53)
永安托孤 君臣盛轨	(59)
第四章 从严治蜀 抑豪禁奢	(63)
豪族骄奢 二牧难驭	(65)
颁布法令 从严治蜀	(69)

经济制裁 抑制豪族	(75)
豪族为官 有选有限	(78)
第五章 以身作则 厉行节俭	(81)
宫殿陵寝 严控规模	(83)
裁官精政 化成之道	(86)
禁酒节粮 路无醉人	(92)
第六章 上下齐心 廉风蔚然	(97)
悉心教诲 后主循理	(99)
官吏选拔 德才兼重	(106)
第七章 南征北伐 量力而行	(113)
出使东吴 重修盟好	(115)
攻心为上 平定南中	(120)
北伐多艰 量力而行	(125)
魂归五丈原 千古叹惋	(132)
第八章 择偶重才 诫子静俭	(135)
娶妻观 德才为先	(137)
纳妾观 香火是继	(141)
育子观 静俭唯本	(144)
第九章 财产公开 丧葬从简	(149)
自报家产 青史第一	(151)
相星陨落 遗命薄葬	(156)
千年沧桑 风骨犹存	(159)
第十章 遗爱久远 垂范后世	(165)
一代名相 德范遐迩	(167)
言传身教 后任效法	(172)



精神不朽 彪炳千秋	(177)
浩气长存 泽被当代	(184)
附录	(187)
主要参考书目	(194)
后记	(196)



第一章

汉末倾颓 呼唤廉政



政治腐败 矛盾激化

三国纷争，源起于东汉末年的政治腐败。东汉末年出现的严重的政治腐败，则要从东汉中期说起。自东汉章帝刘炟（76—88年在位）以后，继位的皇帝年龄都很小：和帝（89—105年在位）十岁继位，殇帝（106年在位）“诞育百余日”继位，安帝（107—125年在位）十三岁继位，顺帝（126—144年在位）十一岁继位，冲帝（145年在位）两岁继位，质帝（146年在位）八岁继位，桓帝（147—167年在位）十五岁继位。皇帝幼小，朝廷权力自然掌握在太后和她的娘家人，也就是外戚的手里。皇帝长大后，想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得摆脱外戚的控制。而在森森皇宫中，皇帝所能见到的男性，就只有宦官。宦官从皇帝小时候就伺候在皇帝身边，直到他们长大，因此，宦官也就自然是皇帝最值得信赖，也是唯一能依靠的一种力量。于是皇帝们便求助于宦官，通过宦官势力来消灭外戚势力。下一届小皇帝登基，外戚又得势，反过来又要消灭宦官势力。

不管谁掌握了权力，首先想到的不是为百姓谋福利，而是怎么在巩固自己的势力之余，为自己搜刮更多的财产。《后汉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顺帝死后梁太后临朝，她的哥哥梁冀专横跋扈了近二十年，他的嚣张气焰使人望而生畏。凡朝廷百官升迁，都要先到梁家求见谢恩，然后才敢去政府部门报到任职。太尉李固、杜乔等耿直之士不肯依附他，都被他诬陷处死。文武百官，顺之者生，逆之者死。他还不惜用诬蔑、下毒、强取豪夺等手段，威吓众人。梁冀在政治上无法无天，生活上更是骄奢淫逸。梁氏为了炫耀其灼天气焰，大肆修建豪华宅地、园林，皇宫般富丽堂皇，他在国都附近开辟猎场，绵延千里。设兔苑养兔，占地数十里。曾令各地上交活兔，不得有任何损伤，违者死罪。曾有一西域商人不知禁令，误杀一兔，结果因此处死者竟达10多人。后来桓帝依靠宦官诛灭了梁氏，没收了他的家财三十多亿，居然相当

于全国半年的财政收入。

到了后来，不仅外戚、宦官腐败堕落，就连皇帝也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开始了卖官鬻爵。汉灵帝就曾和宦官们一起，开了一个叫做西园的官员交易所，标出官价公开卖官，地方官一般比朝官价格贵一倍。各县肥瘦不等，让求官的人估价投标，出价较高的人才能得标上任。定价以外，又看求官的人身份及财产随时加减。如名士崔烈半价买得一个司徒。宦官曹腾的养子曹嵩，也就是曹操的父亲，家境富裕，买太尉花了一万万，比定价贵十倍。又为了优待主顾，增加销售，允许先欠账，到任后加倍还款。买到官位的人，为了尽快收回成本，一到任就加倍搜刮百姓。人民被迫“寒不敢衣，饥不敢食”，贱价卖出自己仅有的一点谷物，让新官一到任就得到钱，以免一家人性命不保。汉灵帝和宦官觉得这样做还不够，命令州郡送助军修官钱，大郡多至两三千万钱，最小的县也不能免。送钱以外还要“价买”木材石料，令州郡运送到京师。宦官派人点收，硬说材料不合格，只给市价的十分之一，转手卖给商人，得到十倍的钱。

一方面，朝廷里腐败不堪；另一方面，地方豪族庄园发展迅速，土地兼并激烈，大批农民沦为农奴或流民。破产的农民流浪四方，生活痛苦不堪。而豪强地主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东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仲长统在他的著作《昌言》里这样描述着：豪强人住着接连数百栋的大宅院，占着大片的良田，蓄养着成群的马牛羊猪，州城郡城里开设着大商店，车船周流四方，贩运奇物宝货。这种豪强连做个伍长的资格都没有，却有成千的奴婢，上万的徒附，享乐比封君还强，势力等于郡守县令。他们养活刺客和敢死队，替他们迫害或杀死穷人。穷人被迫服从，不敢到官府申诉，因为申诉只有危险没有好处。

政治的腐败，使许多人虽有才华和抱负，却无法得到施展。他们试图与宦官、外戚专权作斗争，却大都以失败告终。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又不愿与宦官、外戚同流合污，于是许多名士纷纷选择辞官归隐或拒不出仕。

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张衡正是生于东汉政治日渐腐败，地方豪强日益猖獗的时代。对这些腐败黑暗现象张衡都有过抗争。他曾向汉顺帝上书，讽示近世宦官为祸，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旧，勿



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要求皇帝“恩从上下，事依礼制”。对选拔人才的方法他也提出建议加以改革。在河间相任期时他还积极进行了抑制豪强的斗争。当时朝廷腐败，像张衡那样个人的斗争已无济于事。就在他上书要皇帝警惕宦官为祸不久，顺帝却又下诏特许受封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养义子，继承爵位，使宦官获得了和贵族世家同样的世袭特权！张衡明白了，他的反宦官斗争已没有意义。由于黑暗势力的强大，张衡晚年开始有了消极避世的思想，因而有了《归田赋》之作。他在《归田赋》中写道：在京都做官时间已长久，没有高明的谋略去辅佐君王。只在河旁称赞鱼肥味美，要等到黄河水清还不知是哪一年。想到蔡泽的壮志不能如愿，要找唐举去相面来解决疑题。知道天道是微妙不可捉摸，要跟随渔夫去同乐于山川。丢开那污浊的社会远远离去，与世间的杂务长期分离……这篇赋借意隐的境界表现了张衡在宦官外戚交相干政、朝政日非的情况下对现实的不满和绝望，以及不愿同流合污，想辞官归去的精神。

韩康，字伯休，出身于名门望族，自幼勤奋好学，精通诗书礼乐。他因目睹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现实，无意于仕途功名，便隐姓埋名，浪迹于江湖林泉。他经常到名山大川采集草药，加以熬制，以尽普济众生之愿。韩康卖药行医，走遍天涯海角，三十年如一日。朝廷得知此事，便征召韩康进京做官，汉桓帝亲自备了一份厚礼，命专员驾着驷马高车去请他。当使者手捧圣旨来到山中草庐时，韩康无奈，只好出山，但是他坚决不坐官车，而是自己驾驶一辆牛车。在进京途中，韩康施计逃脱，入深山老林，以高寿无病而终。

庞公，也就是《三国演义》中著名的“水镜先生”庞德公，是东汉末年的襄阳名士。他隐居在襄阳岷山之南，以耕读为业。当时的荆州刺史刘表多次请他进府做官，他都坚决拒绝，刘表只好亲自登门拜访。有一天，庞德公正在耕作，两人就在地里交谈了起来。刘表说，一个人不做官，只是保全自身，而不是保全天下呀！庞德公回答说，有一种叫鸿鹄的鸟，筑巢于高林之上，使其暮而得所栖；有一种叫鼃龟的动物穴于深渊之下，使其夕而所得宿。人们的取舍行止也是人的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他用此生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物各有所求、人各有其志的缘由。刘表接着又问他，先生您辛苦地耕种在田间而不肯做官食俸禄，那么，在您百年之后用



什么留给子孙呢？德公又回答说，当官的人都把危险留给子孙，我却把勤耕读，安居乐业留给他们。只是所留下的东西不同罢了，不能说我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刘表见劝说不动他，只好叹息而去。

政治腐败，上层的知识分子还可以选择归隐不仕，洁身自好，然而下层的百姓却没有选择余地了。人民在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五座大山的残酷剥削压迫下，被逼得没有了生路，只有纷纷拿起武器，与统治阶级展开斗争。早在永初三年（109），就有张伯路领导流民几千人，活动于沿海九郡。阳嘉元年（132），章河领导流民在扬州六郡暴动，纵横四十九县。汉安元年（142），广陵人张婴领导流民，在徐、扬一带举行暴动，时起时伏，前后达十余年之久。桓帝、灵帝时，从幽燕到岭南，从凉州到东海，到处都有流民暴动发生，关东和滨海地区最为突出。流民暴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几百人、几千人扩展到几万人、十几万人。一些流民队伍，还与羌人反对东汉王朝的斗争相呼应。从安帝到灵帝的八十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农民暴动，大小合计将近百次，至于散在各处的所谓“春饥草窃之寇”、“穷厄寒冻之寇”，活动于田庄的周围，更是不可胜数。那时，农民中流传着一首豪迈的歌谣：“小民发如韭，翦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这首歌谣，生动地表现了农民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的英雄气概。

百姓们一起义就杀官吏、烧城邑，以发泄他们对统治者的仇恨。起义的首领有“皇帝”、“天子”、“太上皇”、“无上将军”、“平天将军”、“柱天将军”等称号。东汉政权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摇摇欲坠。



灾荒数现 重人轻财

自安帝以后，由于朝廷吏治腐败，官府横征暴敛；加上长期对外用兵，耗费巨额经费。所有这些沉重的负担，全部落到百姓头上。更不幸的是，东汉王朝末年又出现了各种严重的自然灾害。据《后汉书》“帝纪”和《五行志》、《天文志》等资料粗略统计，从永元元年（89）到建安二十五年（220）间，发生水灾54次，旱灾40次，地震69次，蝗、螟灾29次，瘟疫18次，大风冰雹等41次，基本上每个年头都有灾害发生，甚至一年有多种灾害，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灾害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严重损害。不仅如此，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据《后汉书》，建康元年（144）正月辛丑诏曰：“陇西、汉阳、张掖、北地、武威、武都，自去年九月以来，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夷狄叛逆，赋役重数，内外怨旷。”兴平元年（194），“三辅大旱，自四月至于是月。帝避正殿请雨，遣使者洗囚徒，原轻系。是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以致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严重局面。大批农民四处流亡，饿殍遍野，连京师洛阳也是死者相枕于路。尤其可怕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瘟疫，又给了本已虚弱无比的王朝致命一击。

早在东汉之前，历代王朝都曾有过瘟疫发生。一方面，由于中国是一个季风国家，地处太平洋和欧亚大陆交接处，冬夏气温冷暖不均，气候变化很大，这种特殊的自然环境也很容易引发疾病灾害。根据几千年来古人留下的文献记载，许多种类的瘟疫，如天花、鼠疫、白喉、猩红热、霍乱、斑疹伤寒、伤寒、肺病、麻风、疟疾、血吸虫病等都曾袭击这块大陆。另一方面，由于古人对疾病的认识有限，因此他们往往对瘟疫的具体类型分辨不清。根据古人的解释，所谓疫，就是指“民皆疾也”，意即凡能传染的病都通称为“疫”。至于“瘟”，则是指烈性传染病，可以在禽畜动物与人之间相互感

染。基于此，古代中国把传染病、流行病通称为“瘟疫”。

据历代文献记载，自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20世纪，中国较大规模的瘟疫竟达七百多次。历史发展到汉代，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各种自然灾害，终于导致疫病的大规模流行。即使在西汉王朝的“文景之治”时期，也出现了“民大役死，棺贵”的悲惨景象。到公元1—3世纪的东汉王朝时期，由于瘟疫更是来势凶猛。尤其是在东汉末期，在王朝的统治中心——中原地区，一种可怕的疫病以空前的速度席卷每一个角落，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当时，东汉王朝的各级地方官不断接到大量的病例报告，有的村庄甚至几乎全部死亡。地方官不敢怠慢，赶紧将这些情况上报朝廷。但是令他们失望的是，这时的朝廷却正陷入腐败和混乱之中，对老百姓的生死根本无暇顾及。结果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治，瘟疫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东汉末年的这次大瘟疫，当时人通称其为“伤寒”。有关史料记载，这种疾病的主要症状为：由动物（马、牛、羊等）作为病毒宿主传播，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发病急猛，死亡率很高，患者往往会高热致喘，气绝而死，有些患者还有血斑淤块。在瘟疫来临的初期，面对可怕的瘟疫，人们几乎是束手无策，只能在绝望中等待死亡。

据后世历史学家统计，从公元119年至217年这百年间，就曾有几十次大瘟疫。而在东汉末期的数十年间，大瘟疫更是连绵不断，其死亡人数之多，简直无从统计。东汉末年短短三十年间，有明确记载的全国性大瘟疫共有十二次。在瘟疫流行期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后果十分悲惨。在曾经繁华的中原地区，一度出现了这样的惨状：“家家有位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而当时著名的医学家张仲景，也曾悲痛地回忆道，他的家族本来人口众多，达两百余人口，但在不到十年的瘟疫流行期间，竟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死去了，而其中又有七成是死于伤寒。在东汉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瘟疫竟夺去了一大半人的生命。再加上当时这里不断发生战乱，中原地区陷入极为恐怖的状态。

瘟疫袭来时，一般百姓大量死亡，那些一向养尊处优的上层人士也难逃厄运。著名的“建安七子”就是例子。所谓“建安七子”，是指东汉末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之外的七位著名诗人，他们是：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当曹丕还未称帝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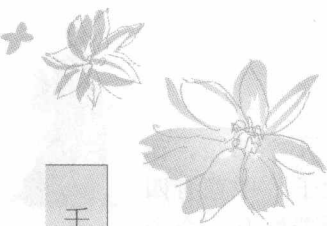


与“建安七子”中的好几位诗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不幸的是，在建安二十二年中原地区的大瘟疫中，著名的“建安七子”中竟有四人染病而死，他们是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眼看着好友一个个死去，曹丕后来沉痛地回忆道：“昔年疾疫，亲故多摧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谓百年已分，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此外，当时许多著名的上层人士，如著名的“竹林七贤”、王弼、何晏等人，基本上都是英年早逝。

尤其是在建安九年至二十四年（204—219），这次被人们称为“伤寒”的大瘟疫达到了高峰，给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在东汉王朝灭亡以后，到三国和晋朝，它又持续了很长时间。稍后的另一位历史学家裴松之就曾说，这场瘟疫“自中原酷乱，至于建安，数十年间生民殆尽。比至小康，皆百死之余耳”。而据《晋书》的记载，甚至在咸宁元年（275）十二月还有发生，“是月大疫，洛阳死者大半”。

在经历了长期的大规模瘟疫后，当时中国的人口大量死亡。尽管在古代并没有明确的相关记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也很不准确，但我们仍可从一些史书留下的数字体会到瘟疫的威力。根据古代较为权威的官方记载，瘟疫爆发前的永寿三年（157）时，全国人口为5650万，而在经历了大规模的瘟疫，仅仅八十年后的太康元年（280）时，全国人口仅存1600余万，竟然锐减达四分之三。而在瘟疫最剧烈的中原地区，到三国末年，其人口仅及汉代的十分之一。虽然当时的战争和灾荒也是造成人口减少的重要原因，但瘟疫所带来的这种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

毫无疑问，东汉末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一个时代。政治腐败、军阀混战、灾荒频仍，再加上闻所未闻的大瘟疫，使得整个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面积荒无人烟的情形。过去曾经繁荣昌盛的城市遭到彻底破坏，土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商品交换也陷入停滞。正是面对这种悲惨的景象，一向关心国计民生的政治家曹操才伤感地写下那首著名的《蒿里行》：



铠甲生虱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形象地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惨状和百姓生活的苦难。

自然灾害对当时人们的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再加上政治的、战争的因素，可以说是天灾与人祸并行，社会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死亡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切身体会到人的生命的脆弱和可贵。财物之于生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思想在东汉末年成书的道教经典《太平经》中有所体现。《太平经》主张轻物重生，不以财物累身。认为，财物的有无、多少，既由命定，那就不仅客观上不可能以人力强求，而且在主观上也不宜产生强求之想。而要在主观上能不产生强求之想，就要懂得财和身的关系，树立身重于财、财为身役的思想；而不要身为财役，以物累身。人只有在生命存在时才能占有财物，身亡也就无所谓有财无财、是贫是富的问题。如果一味为追求财富劳神役形，以致财富多到生时消费不了，死后为别人所有，那就太不明智了，太不值得了。



乱世批判 消奢除淫

东汉后期，官僚贪婪残暴，贵族骄奢淫逸，外戚、宦官更迭专权，豪强地主恣意兼并土地，军阀割据，拥兵自重，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朝廷政治越来越腐败；贫富的差别越来越大；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和激化，一次大的农民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张衡在他的作品《二京赋》中表达了他对统治阶级荒淫享乐生活的强烈指责。他警告统治者，天险不可恃而民怨实可畏，要统治者懂得荀子所说的“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这是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对作者的启发，表现了当时文人对封建统治的危机感。继张衡而起的是赵壹和蔡邕，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对东汉末年是非颠倒“情伪万方”的黑暗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抨击，表现了作者疾恶如仇的反抗精神。这篇赋语言犀利，情绪悲愤，揭露颇有深度。蔡邕的《述行赋》是他在汉桓帝时被当权宦官强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在赋中作者不仅揭露和批判了当时宦官专权、政治黑暗、贵族们荒淫无耻的现实，而且还满怀同情地写出了当时的民间疾苦。

当时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有很多的反映。他们认为治世的权力着眼于天下和人民，衰世的权力则着眼于一己的私利。而他们生活的时代是衰世、乱世。他们对于当时政治和社会的混乱情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并像医生给一个垂危的病人治病那样，给国家诊断危机的症结，开出救治的方案。

王符就是其中一员。王符是我国东汉时期有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他身处东汉衰世，目睹东汉王朝由盛而衰，朝政腐败，豪强肆虐，官吏残暴，群雄割据，外族侵掠，民不聊生的社会政治局面，怀抱强烈的忧患意识，忧国忧民。他在他的著作《潜夫论》中批判了东汉朝廷用人多注意世族，而忽视寒士；许多重要官位，往往任用外戚、宦官，而排挤正直贤能之人。官场往往鱼目混珠，清浊混